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社會統計  
資料彙編

鄭成林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民國時期社會統計資料彙編

鄭成林 選編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民國時期社會統計資料彙編:全20冊/鄭成林選編.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6.4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ISBN 978 - 7 - 5013 - 5735 - 2

I. ①民… II. ①鄭… III. ①社會統計 - 統計資料 - 彙編 - 中國 - 民國  
IV. ①C83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84478 號

書名 民國時期社會統計資料彙編(全20冊)

著者 鄭成林 選編

叢書名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責任編輯 李強

封面設計 敬人書籍設計工作室

---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

開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張 752

---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5735 - 2

定價 12000.00 圓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果 •

## “民國時期文獻出版工作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畫排列)

主	任	周和平	韓永進		
副	主	于群	王建朗	馬秦臨	孫光奇
		張東剛	翟玉霞		
委	員	王筱雯	方標軍	任競	李西寧
		李忠昊	李春來	李培	步平
		吳建中	周建文	洪勇剛	馬振犢
		倪曉建	徐欣祿	陳力	張勇
		鄭智明	劉洪輝	謝林	應長興

## “民國時期文獻編纂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畫排列)

主	任	周和平	韓永進		
副	主	王建朗	陳力	黃修榮	程天權
委	員	王奇生	王開學	毛雅君	方自今
		朱志敏	全勤	何振作	汪朝光
		金以林	周德明	倪俊明	徐大平
		徐曉軍	高紅	陳謙平	桑兵
		孫伯陽	黃興濤	楊奎松	詹長法
		厲聲	鍾海珍	羅志田	

## “民國時期文獻出版工作顧問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建朗	王曉秋	金沖及	馬大正
姜義華	夏燕月	陳鐵健	章開沅
張注洪	張海鵬	張 磊	張憲文
楊天石	劉桂生		

## 總 序

中華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不僅與未曾斷裂的文字記錄有關，也與自古有“易代修史”和重視文獻收集、整理等優良傳統密不可分。明有《永樂大典》、清有《四庫全書》，都是有力的佐證。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日漸加大對古代各時期文獻整理和保護工作的力度，但對具有重要價值又亟需保護的民國時期文獻的重視程度尚需進一步加強。

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而特殊的嬗變時期，新舊交匯、中西碰撞，形成了社會轉型期特殊的文化景觀；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中華民族遭受外侮、充滿災難的時期。僅從文化角度考察，一方面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的整理繼承和批判揚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強烈衝擊和影響著當時人們的思想與行爲。特別是馬列著作的譯介與傳播，不僅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且直接導致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爆發，並由此帶來一系列社會巨變。這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巨大變革，形諸文字，輔之於出版業和新聞業的飛速發展，使得民國時期的出版發行業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短短數十年間，積累了圖書、期刊、報紙以及檔案、日記、手稿、票據、傳單、海報、圖片及聲像資料等大量文獻。這些文獻正是記錄、反映民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重要載體。

概括而言，民國時期文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數量衆多。據初步估算，民國時期文獻數量遠遠超過存世數千年的古籍總量，僅國家圖書館一館所藏就達 88 萬餘冊。第二，內容豐富。該時期文獻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既有政府公報、法律規範等方面的文獻資料，也有



豐富的文學作品。同時，電影及唱片等作品也大量出現。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文獻形式上，均極為豐富。第三，歷史和學術價值高。民國時期，中國經歷了內憂外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篇章，產生了大量革命歷史文獻。這些文獻歷久彌珍，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珍貴資料。民國時期又是各種思想交匯、碰撞的時期，留下了大量記載時代印跡的資料，在政治、法律、語言文字、歷史等諸學科都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對研究民國時期的歷史，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第四，現實意義重大。民國時期形成的邊疆墾務、農商統計、中國經濟志、賑災史料等文獻，對研究國家主權、邊境、民族、軍事以及農業、水利、經濟等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國情教育的生動教材。例如，大量有關“東京審判”的文字記錄、照片、影像資料，集中反映了日軍侵略中國的歷史，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有力證據。第五，紙張和印製品質不佳。民國時期正處於從手工造紙向機械造紙轉換的初期，所產紙張酸性高，加之印刷、裝訂等工藝的自身缺陷，造成了文獻印製質量上的先天不足，致使很多文獻出現了嚴重的老化或損毀現象，其保存難度大大高於傳統手工紙文獻。民國時期文獻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對其進行保護的思路必須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創新，如在文獻普查、原生性保護基礎上，充分利用影印出版、縮微、數字化等再生性保護方式，以期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國家圖書館是國家總書庫，履行國內外圖書文獻的收藏和保護職能，為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立法決策、國內科學研究和公眾提供文獻信息服務。文獻作為一個國家的歷史積澱和文化載體，肩負著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承重任，保存、保護和利用好這些文獻，是圖書館人的歷史責任。2011年，在文化部、財政部支持下，國家圖書館聯合業內相關單位啟動了“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旨在通過文獻普查、海內外文獻徵集、

整理出版,以及文獻保護技術研究等各項工作的開展,切實有效地搶救與保護民國時期文獻。

文獻整理出版是保護計劃的一項重要內容,由國家圖書館策劃,將依據文獻的館藏特色、資料類型、瀕危狀況、珍稀程度和社會需求等方面,整合各文獻存藏單位所藏,彙集相關領域專家與出版工作者等多方力量,採取“民國文獻資料叢編”形式,統籌規劃、有序推進,成規模地整理、編纂出版包括民國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外交等各領域文獻,努力為社會各界提供豐富的、有價值的、便利的文獻資源。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文化復興為標誌。文化的復興,必須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基礎。弘揚傳統文化,又必須以保護、傳承傳統文化為前提。我們堅信,“叢編”的推出,必將為民族復興、文化繁榮做出重要貢獻。

是為序。

周和平  
2013年1月

## 出版說明

民國時期，隨著統計機構的逐步建立，官方、民間都開展了大量的統計工作，編印完成卷帙浩繁的各類統計資料，涉及社會發展與變遷的方方面面。這些資料為民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數據支持，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本社先後出版了《民國統計資料四種》《民國時期司法統計資料彙編》《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彙編》及其續編，收錄了各類統計資料百餘種。此次我們邀請華中師範大學鄭成林教授選編，分國情、經濟、社會三個專題，對這一時期的統計資料作進一步的整理，其中“國情統計”主要針對全國和各地方省市的基本概況；“經濟統計”針對經濟建設、農業、物價、貿易、金融等方面；“社會統計”主要針對社會概況、社會行政、勞工、勞資糾紛、衛生、社會團體、社會病態等方面。

《民國時期社會統計資料彙編》收錄文獻五十五種，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內容：

一、社會概況及社會行政統計，包括山西省長公署統計處編纂的山西第二、三、四、六、七次社會統計（內容包括貧民、宗教、罪犯、自殺等方面），以及北京、天津、青島、西康等地社會行政部門編纂的社會統計資料，以及出版的社會統計刊物；

二、衛生統計，包括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出版的刊物《統計期訊：衛生（主要都市人口死亡之病因統計）》，以及北京、上海、南京、廣西、重慶、廣州等地衛生部門編纂的生命統計或衛生行政統計；

三、監犯統計，主要內容為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出版的刊物《統計期訊：監犯（入監人犯統計）》；

四、人民團體統計，主要內容為社會部統計處編纂的民國三十五

年度職業團體、社會團體等方面的統計；

五、勞工、勞動統計，包括鐵路部門、各地工廠的工人人數、工資、受教育程度、年齡、工作時間、生活費方面的統計資料，社會部勞動局統計室出版的刊物《勞動統計月報》，以及上海市社會局編纂的罷工停業、勞資糾紛統計；

六、社會公用事業與社會福利統計，包括上海市民國三十五年公用事業統計，以及社會部編纂的全國一九四四—一九四七年社會福利方面的統計。

本書內容即按以上六類進行編排，同一類下又綜合參考了行政區劃和出版年來進行排序。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社會統計資料，編撰者主要是社會行政機構，涉及區域也主要集中於政治局勢相對穩定的山西，以及統計經費、人才相對充裕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數據質量也參差不齊，因此在引用的時候需要進行仔細的辨識。

上述統計資料雖然較早地得到關注，但關於民國時期社會統計工作和統計資料的系統研究，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對社會史研究和民國史研究有所裨益。

本書所收錄的文獻有相當一部分是油印本，印刷品質較差，敬請讀者諒解。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〇一六年四月

# 中國近代統計及其學術內蘊

鄭成林

據《禹貢》記載，中國統計緣於夏禹時期的結繩記事<sup>[1]</sup>。殷商時期，書契記數取而代之，主要用於軍事、祭祀和田獵等方面，并有專職官員負責。“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sup>[2]</sup>，因此，春秋以降統計日益為政府所重視，範圍漸廣，內容亦日豐，戶口的調查統計甚至漸成制度且具規模<sup>[3]</sup>。秦漢時期還建立了全國統計報告制度，即上計制度。又頒行律條，用法制的形式對統計行為及制度進行規範，保證計數準確可靠。嗣後，統計漸趨制度化，并編纂有《國計簿》《會計錄》等統計資料，內容涉及人口、田糧、俸祿、軍餉、賦稅和交通運輸等。不僅如此，少數官員、學者還對這些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剖析社會現象和改進政務方式。不過，這些統計多是事實的簡單羅列，對統計的認識及分析也多屬就事論事，缺乏學理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統計”，是“綜合考察”和“總計”之意<sup>[4]</sup>，因此，採集的多是概數而非實數，主要體現指向性，數量之間多不能吻合。

鴉片戰爭後，受西方統計知識和理論的影響，中國統計逐步轉向注重實際數、絕對數的採集，數量亦漸趨一致。一般來說，中國近代

---

[1] 劉大鈞：《中國統計事業》，載《統計論叢》，黎明書局一九三四年版，第一百四十六頁。

[2] 《管子·七法》。

[3] 中央統計聯合會：《統計演講集》，中華書局一九三七年版，第二百一十九頁。

[4] 黃興濤、夏明方：《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的興起》，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二頁。

統計起源於一八五九年海關冊的編製<sup>[1]</sup>。但這些統計多集中於進出口貨物、物價及運費，主要服務於洋行洋商，對中國社會經濟影響甚微。甲午戰爭後，大量中國人赴日留學，對近代西方統計知識有了初步瞭解，對日本政府將統計學運用於國家政策制定的印象最為深刻。於是，在引介和傳播西方統計知識的同時，開始仿行對中國的土產等進行調查統計。清季新政時期，一批日本統計學專著被陸續譯介到國內，以橫山雅男的《統計通論》影響最大。“為推知國家現勢之若何”，“外觀世界之競爭”，“以定施政之方”，清政府於一九〇六年在憲政編查館下設統計局，負責全國綜合統計，諭令“各部院、各省應就其所管之事，詳細列表，按期咨送”<sup>[2]</sup>。這是中國首次成立最高的獨立統計機構，也改變了統計附屬於其他官僚機構的局面。

兩年後，民政、度支、陸軍、郵傳、農工商等部及大理院，先後設立統計處，分別負責各部門的統計業務。同年，各省次第成立調查局，分設統計、法制兩科。統計科置三股，主要掌管外交、民政、財政、教育、軍政、司法、實業和交通等領域的統計。嗣後，各司、道、府、州、縣等，紛紛設立統計機構。無論是中央各部的統計處，還是地方的統計機構，在業務上皆受憲政編查館統計局的指導，這意味著中國初步建立了相對獨立的全國性統計系統<sup>[3]</sup>。不僅如此，統計事物不再由政府壟斷，主持者由政府擴展到報館、郵政、海關、學術機構及個人等方面，統計方法中的統計圖表法也自海關貿易推廣至教育、司法等領域。但統計系統之間的聯繫較為鬆散，統計資料“更多的具有政治意義，而非體現社會實情或狀態”<sup>[4]</sup>。

---

[1] 劉大鈞：《中國統計事業》，載《統計論叢》，黎明書局一九三四年版，第一百四十七頁。

[2] （清）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第五千七百二十一頁。

[3] 莫日達：《中國近代統計史》，中國統計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六頁。

[4] 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二百五十四頁。

民國伊始，承襲清制，中央各部門仍置有統計專科，地方省市也多設有規模不一的統計處（科、股），“專辦的統計機構也風起雲湧，頗極一時之盛”<sup>〔1〕</sup>。祇是最高統計機構隸屬與名稱發生了變化，先是屬於總統府政事堂的主計局，在一九一六年政事堂撤銷後，改爲屬國務院統計局。然而，因政權更迭頻繁，原本不掌實權的統計局更加難以統籌全局并有效開展工作，淪爲有名無實之境，工作成績十分有限<sup>〔2〕</sup>。不過，這時期統計教育受到政府和知識界的重視，開設統計學的高校和專業與日俱增。此外，在梁啓超的倡議下，學術界深化了“用統計方法治史”，豐富了中國史學理論與方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爲周知人口、土地、資源以及政事之情況與變遷，“以爲政府決定政策、釐定計劃、考核工作與宣示政績之依據”<sup>〔3〕</sup>，幾乎所有的中央部門和省市政府都設立了統計機構，或聘用其他部門兼辦統計事宜。成效最突出的是一九二九年立法院成立的統計處。該處除了專職工作人員外，還有兩千多人分佈於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編製了一些產生重要影響的統計報告，并於次年召集舉辦了統計聯席會議，部分承擔著全國最高統計機構的職責。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主計處成立，是爲全國最高統計中心機關，這標誌著中國自上而下的獨立統計體系的形成和中國統計工作邁入新時期。

在主計處的推動和主持下，國民政府頒行了一系列有關統計事務的法律法規，舉辦訓練班、補習教育等形式培養統計人員，編印統計期刊、翻譯西方統計著作等推進信息交流和統計理論的討論，同時將登記法從調查法中分離出來，視爲一種獨立的統計方法，并推廣應用

---

〔1〕 吳大鈞：《我國之統計事業》，《統計月報》第一一三、一一四合號，一九四七年二月。

〔2〕 吳大鈞：《我國統計制度之研究》，載《統計論叢》，黎明書局一九三四年版，第五十頁。

〔3〕 吳大鈞：《我國之統計事業》，《統計月報》第一一三、一一四合號，一九四七年二月。

抽樣調查和編製統計指數，留下了浩如煙海的統計資料<sup>[1]</sup>。須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社會各界也積極開展調查統計，以服務於社會建設、社會革命或學術研究。主要力量包括高等學校、社會團體及知識分子，其中以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和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成績最顯著。此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也開展了富有成效的調查統計。這些非官方的統計多以調查報告或學術論文的形式呈現，因此，大都經過縝密的審核和嚴謹取捨，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與官方的統計相互補充和相互印證，共同構成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資料寶庫。

統計資料多以數字形式呈現，因此，具有文字記錄、圖片圖像等史料無法比擬的優勢。實際上，中國有著統計治史的傳統<sup>[2]</sup>。在梁啟超倡議後，中國知識界自覺將西方統計理論和方法運用於史學研究，并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嚴中平、梁方仲、吳承明等學者，多次強調將統計學運用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凡是能夠計量的，儘可能作些定量分析”<sup>[3]</sup>，並身體力行地編纂出版了一系列統計資料和研究成果。儘管這些統計多不是專為學術研究設計和搜集的，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尤其是不精確，有的可能還不準確，且無法重新採集和證實，若不能善用，得出的結論可能謬誤千里。但歷史資料無謂對錯，都有自身的價值，何況哪里有沒有局限的資料？即使可信的資料，也存在不足或遺漏之處，這取決於使用者如何甄別和利用。

隨著信息技術全面融入社會生活，構建和分析大規模量化資料逐

---

[1] 馬敏、陸漢文：《民國時期政府統計工作與統計資料述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二〇〇五年第六期。

[2] 梁啟超：《歷史統計學》（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載《梁啟超演講集》，天津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一百二十六頁。

[3] 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雲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五十六頁。



漸成爲全球學術研究的一種新趨勢<sup>[1]</sup>。在大數據時代，統計資料的“二不”特性對學術研究的消極影響，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主要原因在於，新時期的統計分析追求的是“更全、更細緻”的數據，而非“更精、更複雜”的方法<sup>[2]</sup>，不再熱衷於因果關係的解釋，而是尋找事物之間的相關關係<sup>[3]</sup>，儘可能地將定量分析的研究廣度與定性分析的視野深度結合起來。就此而言，統計資料具有其他資料無法替代的有用性。相比統計數據的不準確，學者更憂慮的是，統計數據的缺失、破損和不完整。誠如有學者指出，統計分析較少用於中國史研究的主要原因“在於數據不足”<sup>[4]</sup>。不過，即使有充分且準確的資料，統計分析也存在局限性。吳承明多次提醒，統計分析可以用於檢驗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創立新的論點”<sup>[5]</sup>。

中國近代統計資料的數量多、載體多，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軍事等國事民情，內容豐富至極。儘管這批統計資料還沒有得到學術界足夠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但仍有部分學者有效地利用了部分資料，推出了一批具有創造性的成果。相對而言，對近代統計活動、過程及制度構建的學術關注，更顯不足和薄弱。換言之，若祇是將這批資料視爲重要史料顯然不夠，更重要的是將統計調查本身作爲一種社會行爲和學術活動方式，加以整體關注和深入研究。具體而言，研究的重點不在於統計數據，而是近代統計在中國的興起及演變，諸如主持統計的有哪些機構、組織和個人，它們統計的主旨、內

---

[1] Ruggles, Steven. *Big Microdata for Population Research*. *Demography*, 2014. 51 (1): P287 - 297.

[2] 梁晨、董浩：《必要與如何：基於歷史資料的量化數據庫構建與分析，以大學生學籍卡片資料爲中心的討論》，《社會》二〇一五年第二期。

[3] 陳爭平：《大數據時代與近代經濟統計研究》，《量化歷史研究》第二輯，二〇一五年第一期。

[4] 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新史學》（臺北）一九九〇年第一期。

[5] 吳承明：《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二百四十八頁。